

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政党引领逻辑^{*}

邹庆国

[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表征着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正式进入人类现代化叙事之中。西方早发现代化之路及其基于西方经验的现代化理论,正面临着深重困境。一些发展中国家因政党角色缺位,政治逻辑异化而走向依附式现代化之路。中国共产党在解决近代以来“国家无效”和“社会一盘散沙”的历史难题中,把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与开辟国家现代化新路的历史责任紧密结合,展示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政治逻辑。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质。党的理想与信仰、立场与使命融入现代化要素体系,推动政党价值与现代化价值的相融与互塑,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和叙事逻辑,实现了对西方话语垄断的解构和“元叙事”体系的拆解,创造出人类现代化的中国“范型”。

[关键词]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政治逻辑;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22)06-0003-1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党的二十大确立的鲜明主题和奋斗目标。习近平明确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P22)}“中国式现代化”表征着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正式进入人类现代化叙事之中。从国家建构、政党作用、社会制度等方面,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政治逻辑,展示“中国特色”的内在特质,对于跳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认知陷阱,破除西方学界对现代化解释权的垄断,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范型”意义,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和叙事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人类现代化模式的理论分野

14世纪—15世纪以后,作为观念和实践的现代化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表征着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重构,展现出人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实现革命性跃迁的历史景观。“现代化”一词最早出现于18世纪70年代,其原初含义反映的是人们对于由工业化所引发的社会形态变迁趋势的思考。西方学者在对现代化的认知、描述、阐释过程中,形成了流派众多、林林总总的现代化理论。20世纪中叶以后,获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开启自己的现代化进程,逐步形成了崭新而独立的“现代化学”,先后构造出多样化的学理范式和解释框架,内蕴着不同的现代化逻辑,呈现基本的理论分野状况。

收稿日期:2022-10-26

作者简介:邹庆国(1971—),男,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党的建设与孔繁森精神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博士,山东聊城 252000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基本规律与实践路径研究”(批准号17BDJ03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近代以来,在公认的现代化发源地欧洲,一些民族和地区走出中世纪的分裂状态,开始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铺垫开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成为现代化进程的起点。即是说,早期现代化理论往往是与国家建构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国家建构与转型的视野中,“现代化”意味着国家叙事方式的全面转换,通过对其驱动主体、动力来源、空间范围、速度效率、步骤安排等相关要素的揭示,创设出观察一个国家现代化模式的重要视点,也成为各种现代化理论的建构依据。在这些理论流派中,就影响力而言,有三种代表性的理论思潮。一是以阿尔蒙德为主要代表的正统现代化论。这一理论把世界各国分成传统国家和现代国家两大类。现代国家指的是以英国、美国为主要代表的早期工业化国家;那些在二战以后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具有现代性,属于传统国家类型。此理论认为,前者为后者走向现代化提供了现成答案和固定标准,后者经过现代性累积中不可避免的阵痛之后,逐步摒弃并排除传统社会的历史负累,过渡到现代社会。二是以古斯菲尔德、班迪克斯等为主要代表的现代化国家修正论。此理论认为,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具有复杂多面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物,传统性并不必然就是落后性、顽固性的消极元素,造成对现代性的绝对反动。在相当多具有传统特点的发展中国家,一些具有浓郁传统气息的诸如等级制度、种姓制度、裙带关系等元素,与现代性的某些层面或成分进行结合转化,反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并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的社会动员与利益整合功能。三是以亨廷顿为主要代表的政治秩序论。这一理论是基于对第三世界现代化实践的长期观察和评估形成的,提出著名的“亨廷顿悖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2](P31)}。在亨廷顿看来,经济发展必然要求更大范围和程度的社会动员,一旦社会动员的速度超过了现有制度所能满足和应对民众政治参与需求的限度,就会引发政治秩序的崩溃,现代化进程就会中断甚至倒退。对于这些传统国家来讲,要想防止政治动荡和政治衰朽,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建立起强大的政府。构建和维持强大的政府,离不开强大政党的创建和巩固。衡量政党强大与否的标准,关键在于力量,而不在于数量多寡。除上述三种主要现代化理论流派之外,还有依附主义、发展中国家阶级论等诸多思潮,共同构成了西方学界主导下的现代化理论“大观园”。

总体而言,在西方现代化理论谱系中贯穿着两条基本主线:一条是把世界分成现代化国家与传统国家两种基本类型,围绕现代与非现代、西方与非西方两种对立的国家类型展开现代化的经验分析、模式阐释和路径讨论;另一条是各种理论本质上秉持“欧洲中心论”的偏颇立场,认为对于那些打算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欧美发达国家所创造的现代化模式、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是绝对标准和唯一归宿。围绕上述两条主线,西方现代化理论从早期诞生于欧洲,聚焦于社会形态跃迁问题,以梅因、涂尔干、滕尼斯、韦伯等为代表人物的社会学研究领域,转向以美国为学术重镇,突出国家建构主题,以阿尔蒙德、亨廷顿、福山等为代表人物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在理论建构上,以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为范本,基于现代化与工业化、现代化与民主化、现代化与城市化、现代化与中产化、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多元观察视角,确立起要素排序明确、因果链条清晰的“经济增长—社会动员—价值观改变—政治参与—抵达自由民主”的所谓现代化标准模式。在对这种基于西方经验的现代化模式阐述中,确立起西方的现代化叙事体系,并为其贴上“普世价值”的标签,不断进行话语“包装”和学理“修饰”,创设出“抵达丹麦”的诱人童话,长期垄断着现代化的解释权和话语权,表现出“此路是我开,必须跟我来”的傲慢与自负。

现代化起源于西方,绝不独属于西方。以英国为典型代表的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是伴随着启蒙思想的曙光和工业革命的机器轰鸣进入人类历史视野的,建立起以工业化率、GDP 比例分割、城市化率、国民识字率、人均寿命等为主要要素的指标体系,确立起“思想启蒙—技术革命—工业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实现现代化”的模式化路径。应当看到,西方早发的自发式现代化之路及其基于西方经验的现代化理论,正面临着深重的困境,绝非完美无缺的唯一模式,逻辑自治性严重不足。以自

翊为创造了现代化“完美神话”的美国为例,其现代性所标榜的“科学”和“理性”,已经被“偏执”和“反智”所取代。2021年底,罗伯特·卡根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万字长文——《我们的宪法危机已经到来》,认为“美国正陷入内战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和宪法危机”,“美国将进入民主崩溃的黑暗世界”^[3],并把这个时间点准确到2024年11月特朗普参加总统大选“复辟”之时。在西方现代性语境中,被封神的资本持续失控,不断冲撞公平正义的底线,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最终没能脱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判断:“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4](P406)},堕落为现代化的反噬力量;西方将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神化为“终结历史”的唯一模式,屏蔽掉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的血腥历史记忆。一些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阴暗心理,源于他们对于霸权变动后遭受清算的西方现代化逻辑的执念和幻觉。时至当代,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当广大发展中国家大多获得独立主权、意图借力全球化资源推进本国向现代国家转型时,欧美原发现代化国家却产生了一系列怪象: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剧烈涌动,精英群体的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这恰恰折射出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主要遵循的是缺失道义力量、奉行双重标准的霸权扩张式、掠夺式的现代化逻辑。

如何克服西方式现代化逻辑给人类带来的严峻挑战,已经成为关系人类命运的重大课题。“现代化表征着一场人类逐渐摆脱异化状态和减少依附性,实现物质生产和精神世界的多侧面、全方位重构的历史发展运动,凝结着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体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5]。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范畴,不能用固化性思维和封闭性标准去界定其含义。所谓现代,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意义上的范畴。现代化作为一种崭新的历史取向,凝结着各国人民的共同向往。尽管各个民族和国家因历史情境和国情条件的差异,迈入现代化门槛的时间有先后之别,但广大发展中国家决不能被剥夺独立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权利。当代西方国家遭遇的深重困境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新道路、建构新模式,实现现代化理论的再分野,打破西方式现代化理论的垄断地位提供了重要契机。

二、现代政党与发展中国家开辟现代化道路的政治逻辑

探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价值和世界意义,离不开对历史条件与发展逻辑的全方位分析,离不开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之路的经验比较。二战之后,随着旧的殖民体系的瓦解,一系列殖民地国家先后走上民族独立与现代化的并行之路。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格局两极化的“冷战”背景下展开的,与西方传统的“思想启蒙—技术革命—工业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实现现代化”的路径相比,最大的区别不是要素差异,而是要素排序的迥异,大体可以描述为: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工业革命—思想革命—依附式现代化。这是一条典型的后发型被动依附式现代化之路,其中的政治革命是在主权不完整条件下,通过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简单复制实现的。这正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不稳定之根源所在。这种模式中的社会革命所结出的“果”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工业革命之“果”是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原料输出地与产品倾销地。思想上经受“现代性”洗礼的结局,则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既在政治和经济上丧失独立性,在精神和文化上处于依附地位,习惯用西方确立的标准来确证自己。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在现代化进程中被高度“同质化”,造成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理论幻觉。最具说明力的案例莫过于曾经被誉为后发现代化经典模式的“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时至今日,我们看到的是金融危机后长期动荡的一些东亚国家,以及深陷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

对于一些走向依附式现代化之路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政治逻辑

的异化,最终走上的现代化之路是一条“邪路”。亨廷顿敏锐注意到一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参与和民主发展一旦缺乏国家建构的强力支撑,往往会成为滋生政治依附主义的土壤,产生政治动荡和政治衰朽的温床。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著名的“强大政府论”,或曰“政治秩序论”。他超越之前的现代化理论的关键之处在于:现代性中的好东西不会一同出现。现代性的诸要素是相互依存的整体,各要素有自身独立的发展逻辑,成为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构件。现代化的不同组成部分必须依次展开。政治衰朽和政治动荡是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典型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2](P4)},依靠复制以美国为代表的政治发展模式推进现代化必定要吃苦头。亨廷顿的观点带来的启示是: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决定着不同的政治发展逻辑。美国没有经历过民主革命的苦难而坐享了民主革命的成果。这个国家一诞生就引进了英国式政体和施政方式。历史经验的差距使美国无法认识到现代化过程中的有效权威问题。其基本路径就是把自由和选举作为政治发展的起点。但是,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并不适用这条道路。“进行有意义选举的前提是要有一定水准的政治组织。问题不在举行选举,而在建立组织。在许多——如果不是绝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选举只会加强那些闹分裂的并且常常又是反动的社会势力,瓦解公共权威的机构”^{[2](P6)}。由此,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建立合法的政治秩序是现代化的首要问题,自由和选举需要强大政治权威的保障。这才是其现代化的逻辑基点。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总结的那样:“实际上,为了启动经济增长,强大的政治制度往往是必需的;恰恰是它的缺席,将失败或脆弱的国家锁进了冲突、暴力和贫困的恶性循环。”^{[6](P44)}

人类社会步入现代化以来几百年的历程证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会是一场理论推演,也不可能是自然而然的实践积累,需要有先进政治组织、权威力量的引领、动员和控制。“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2](P341)}。亨廷顿尽管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在凝聚政治权威,矫治腐化之风,维持政治秩序,引领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但对政党的产生方式、本质属性、历史使命等关键要素及其对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发展的作用,并未作出更为深层的探究,致使其现代化理论最终未能脱离“欧洲中心论”的窠臼。在亨廷顿看来,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民族振兴的参照样本和唯一归宿。他在论述第三世界国家推进现代化的艰难历程时,并没有充分论及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利用旧的宗主国地位,对这些国家实施的主权分割、政治压迫和经济控制,导致这些国家无法独立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之路,成为依附主义现代化思潮的典型代表。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党在国家现代化中的使命担当与历史作为,决定着其现代化模式的类型归属。从一般意义上讲,“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政党都往往与变革、革命的需要相伴而生,‘革命党’普遍是其最初的展现形态,而创造独立、民主和现代化则往往是其革命的基本使命”^{[7](P142)}。然而,当我们把眼光投向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中地区之一——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党发展图景的时候,会发现这些政党基本是在19世纪上半叶实现民族独立之后建立起来的,分为自由党和保守党两大类型,直接模仿早发现代化国家的政党制度进行运作,成为寡头集团政治斗争的工具。即是说,这些政党在政治革命意义上的民族独立、国家建制中是缺席的,并未发挥出把握现代化主动权、引领现代化方向、创造现代化范型的作用,背离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内在规律,最终陷入“拉美陷阱”的泥潭无法自拔。政党政治也遭遇政治庇护主义色彩浓厚、与社会严重疏离、意识形态空心化、政党认同水平下降等多重困境。由此可见,亨廷顿关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角色只是一种浅层阐释,缺乏对其在政治革命中建构新国家、确立政治权威,进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逻辑揭示与规律阐发,愈来愈暴露出

理论上的局限性。

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政党引领逻辑

走出传统,迈向现代,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矢志不渝追求的美好愿景。近代中国是在传统帝国体系解体、社会一盘散沙、内外危机交织,救亡图存成为首要使命的历史情境下艰难启动现代化进程的。“我们可以这样描述中国迈进现代化门槛时的最初形态:帝国的规模、崩溃的权威、分裂的社会、坍塌的信仰、贫弱的机体。显然,这种现代化不是内生的要求,而是外力使然;不但缺乏应有的社会基础,而且缺乏有效的主导力量”^[8]。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疆域广袤、人口众多、积贫积弱是基本国情。在世界历史的叙事逻辑中,中国近代陷入的严重民族危机,是西方早发现代化模式的“恶之果”。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先发优势,在资本扩张力量和市场逐利逻辑的驱动之下,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现代化成本,推行的是一条掠夺式、霸权式现代化之路。面对民族危机,中国社会中的觉醒群体和政治力量先后登上历史舞台,尝试引领中国融入世界现代化潮流,实现救亡图存和民族振兴。从追求朴素平等的太平天国运动,到以器物求强、实业求富的洋务运动,再到以制度改良为要义的维新变法运动,又到以政治革命为核心目标的辛亥革命,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政治主体,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都在客观上推动着中国融入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潮流之中。这些尝试和努力均以失败告终,每一次失败都进一步揭示近代中国摆脱民族危机,实现国家富强的深层逻辑。“在社会无力、国家无效的状况下,中国要维系规模巨大的整体,并努力将其带上现代化发展的轨道,就自然需要第三种力量,这就是政党”^[8]。辛亥革命的结果表明:力量羸弱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显然无法承担这样的历史使命;奠定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的基础条件,离不开理论科学、使命崇高、力量强大的先进政党的正确引领与广泛动员。

正是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之问的各种答案都无法根本改变民族前途命运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类型的政党,有着科学理论的指导和崇高的信念信仰,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能够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在世界历史的时空维度中,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是落后国家探寻适合自己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伟大实践。西方国家属于“早发内生型”道路,最根本的逻辑基点在于,是在完成民族国家建构、主权完整的情境下开启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现代化故事的典型和独特之处在于,近代以来,以民族独立、救亡图存为首要目标的政治革命是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互绑定、互相依托、并行推进的。在此,中国共产党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革命的首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实现了依存互动与逻辑自治。

解决“国家无效”问题,内蕴着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第一重逻辑。民族复兴、推进现代化的前提是民族独立和主权统一。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写道:“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4](P397)}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完成历史使命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彻底的政治革命,实现国家政权的重建,维护主权独立和统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现代化中的功能,与自由民主语境中的政党存在着根本不同。她一开始就不是从民主的终极价值和典型范式出发,纯粹为民主运行而生的,更不是作为民主装饰品的选举工具,而是领导被压迫的中国人民通过暴力革命方式夺取政权、建构国家。如果没有这个根本条件,那么走上的现代化道路就只能像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在未能完全脱离旧的殖民体系,通过彻底政治革命实现主权独立的条件下,就按照西方早发现代化模式匆忙开启国家现代化进程,造成对自身现代化逻辑的背离与反动,沦为依附式现代化模式的牺牲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斗,取

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铺垫起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国家建构条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社会制度条件。

解决“社会一盘散沙”问题,内含着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第二重逻辑。“一盘散沙”的说法是由梁启超首先提出的,成为对近代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总体描述。可以说,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领域一盘散沙的碎片化、离心化状态。“组织起来”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一个基本共识。在政治革命和国家现代化的视野中,“组织起来”既是政治革命的主体动员途径,又是通过革命实现政治稳定化、秩序化的目标归宿,还是蕴含现代性要素的新型社会共同体建构的必要环节。“组织起来”的首要条件是重塑政治权威。“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合理化,并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等五花八门的政治权威”^{[2](P27)}。中国共产党坚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和精神品格,以自身所特有的思想引领力、组织凝聚力、道德感召力、行为示范力,为在黑暗中苦苦探索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与希望,成为实现社会动员与组织的强大权威主体。20世纪30年代来到延安的埃德加·斯诺把共产党人身上体现出的权威性力量称为“东方魔力”,认为这是一个深得民心、充满活力、前景无限的政党。但是,在小农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农民为主体的近代中国,“组织起来”面临着更为特殊的困难。马克思曾对法国农民作出分析:“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在他看来,法国的农民“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4](P768)}。他们之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无法形成共同利益关系,不能形成政治组织,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取得农民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4](P769)}。在近代中国,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开展政治革命的失败,本质上是不能有效组织农民,脱离最基础的社会民众,是社会动员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理想、勇气和精神凝聚人心,以行动、作风和能力引领社会,通过开展土地革命实现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解放,实现了社会的有效动员,促进了中国农民在思想、生活、行为等领域的全方位变革,为开启现代化之路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现代化中的强大组织动员能力,亨廷顿高度认同。他认为,“彼此不信任和人心不齐使社会变为一盘散沙。政治发达社会与政治不发达社会的水火岭就是各自拥有组织的数量、规模和效率”,“在当今世界上,建立这种机构的能力实在很缺乏。共产党人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所提供的,首先就是这种满足道德需要和创建合法公共秩序的能力”^{[2](P24-25)}。

中国共产党把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与开辟国家现代化新路的历史责任紧密结合,展示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逻辑,即以先进政党凝聚权威,以武装斗争方式完成政治革命,国家建构与现代化进程互相依托、同步推进的历史逻辑。政治革命为国家现代化提供制度基础和内生动力,国家现代化又为政治发展提供运行空间和实践基础,贯穿其中的主体性、主导性、权威性政治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逻辑表明:对于国家主权不完整,缺失民族独立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先进政党的权威主导和组织动员,既是主权国家建构的核心要素,也是国家现代化顺利推进的重要引擎。

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范型”创造

党的二十大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习近平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P23-24)}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质,为中国式现代化铸魂塑型。党的理想与信仰、立场与使命融入现代化要素体系之中,实现了政党价值与现代化价值的相融与互塑,创造出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范型”,标志着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诞生。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由中国式现代化的时空特征决定的。任何文明形态都是特定的时空条件的产物。西方式现代化具有历史维度的先发性、驱动力来源的内生性、实现方式的暴力性、财富积累的掠夺性等典型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之路正式开启,面临着独特的时空情势。一是历史时序上的后发性。如果以规范意义的现代化来看,中国正式启动现代化的历史起点比西方晚了几个世纪,非但不具有先发优势,而且很难融入早发现代化国家所塑造的世界性资源配置秩序和全球化体系之中享用已有的现代化成果和资源,后发劣势明显。二是现代化基础的薄弱性。现代化不是随意挥就的历史画面,需要资源汇集和要件积累。基础薄弱、起点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突出难题。正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指出的:“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9](P225)}三是发展模式上的赶超性。从石器、青铜、铁器为标志的农耕时代到工业革命后的蒸汽时代,再依次进入电气时代、信息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在跃迁路径上呈现清晰的间隔期趋短的加速化特点。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必须及时融入,否则步步被动。这就客观上赋予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以典型的赶超特点。四是发展道路上的自主性。在二战以后两极化的国际格局中,中国所走的现代化之路绝不能靠复制模仿,否则就会重蹈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式道路的覆辙,沦入新殖民主义的陷阱。中国必须坚持道路探索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中国发展现代化的时空条件所呈现的特点,决定着必须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核心支撑要素,承担领导党和执政党的双重角色,发挥先锋型政党和使命型政党的复合功能。在时空压缩的特殊情境下,突破传统的单一线性、渐次发展的固定路径,发挥强大的社会动员、组织、控制能力,集中力量和资源推进重点突破,实现现代化的“弯道超车”。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9](P214)}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明确指出:“一定要认清,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是我们自己的,不是从哪克隆来的,也不是亦步亦趋效仿别人的。无论我们吸收了有什么有益的东西,最后都要本土化。”^[10]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色和最大优势,能够发挥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政治权威主导作用,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克服基础薄弱的先天不足,遏制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冲击,坚守现代化的正确价值取向,多元化汇集现代化的驱动力量,展现和谐、秩序、平衡等现代化的“中国式”特征。2022年7月26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作出深刻总结:“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11]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制度属性的逻辑必然。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在特定的政治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之中展开的。政治发展既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又决定着现代化的内在属性和外在标准,遵循独立于经济发展的自身逻辑。一个国家政治道路和社会制度的选择,决不能依靠复制模仿,否则,会从根基上颠覆和破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系统。“古今中外,由于政治发展

道路选择错误而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12](P10)}。任何社会制度都内蕴着特定的价值选择和行动逻辑,进而规定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范型”样态。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社会制度属性。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体现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是契合中国实际,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制度。习近平指出:“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12](P12)}

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规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架设起现代化的“四梁八柱”,保证着现代化进程行稳致远。历史证明,即使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波折,我国在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国防尖端科技、文化体育等现代化领域仍然取得了重大进展,根本原因就在于道路和制度没有“变向”、没有“变质”。严格意义上讲,现代化探索中的“中国式”,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共生并进的。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会长马尔科姆·麦克唐纳时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13](P496)}同年3月30日,他正式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阐发了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累积性、渐进性、内生性特征,也向世界展示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景观。正如习近平所说:“我国的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12](P7)}世界历史进程中各个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的多元性,本身就是现代化模式多样性特质的映射。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在历史的尽头矗立的,则是发达工业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14](P89)}的狭隘观点,即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生态主义的内在规律,体现出理论上的自负与傲慢。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证明: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同样可以实现现代化,这是对“现代化=西方化”论调的有力反驳。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本身就是新旧政治领导力量新陈代谢的历程。中国共产党是改变近代以来中国命运,实现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的领导者、动员者、组织者、行动者。党的性质宗旨和目标使命都在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中得以完整体现。党的领导是这一制度和道路的根本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失败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验证了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唯一性、长期性和排他性,坚持共产党在各种政治力量排序中的最高层次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内生性特质,是超大型国家实现高效治理,走后发式、赶超型现代化道路,实现顺利转型的最大制度优势,是解读“中国奇迹”“中国奥秘”的钥匙。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政党价值与现代化价值的相融与互塑,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范型”创造。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P22)},并从五个方面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范型”样态,展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党的价值追求与现代化本身所蕴含的进步元素实现了双向互塑,创造出中国式现代化

的内在特质和独特气蕴。

其一,宏大性与规律性。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国情。“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1](P22)}。从基本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要求。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艰巨任务和复杂情境,决定着其路径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先进行要素积累,然后顺序递进式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国需要多要素协同培育、多维度赶超推进,体现现代化布局的宏大性,内含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共通性规律,具有普遍性的价值意义。

其二,正义性与普惠性。反对和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诉求。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着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15](P11-12)}。在作为资本家及各种垄断利益集团代言人、代理人的资产阶级政党所主导的西方式现代化逻辑中,公众福祉始终屈从于资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所引领并形塑的现代化,始终以满足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为基点和归宿,表达着公平正义的原则立场,内蕴着普惠共享的价值追求。

其三,全面性和协调性。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准和目标。西方式现代化是以资本的逐利本性为动力来源的,奉行“资本至上”的现代化逻辑,人们普遍把金钱至上、物质主义作为生命价值的归宿和生活意义的寄托,造就了资本人格化的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带来了人的劳动及人类自身的深度异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把“人始终是主体”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贯穿整个现代化进程,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解放为终极追求,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现代化主体地位,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共同促进的发展路径中,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性和协调性特征。

其四,和谐性与可持续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内含的自然伦理观和生态文明理念。西方式现代化把“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作为现代性生产—生活方式的基本图景。其现代化理论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观点,更多表达出人类作为“地球支配者”的人类中心主义姿态,是以“自然环境恶化影响了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在“物与我”的对立中建构其生态道德的认知基础。西方学界从古希腊时代流传下来的自然法和自然主义历史遗产中,更多看重的是人的自然权利,而很少涉及人对自然的生态义务。中国式现代化站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高度,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指导,坚持“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根本观点,认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16](P360)},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永续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理念,推动人类现代化进程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范式转型。

其五,和平性与共建性。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西方式现代化的老路充满了战争、掠夺、殖民等血腥罪恶,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是以非西方国家的落后为代价的。伴随着近代以来西方殖民化进程,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占据着经济全球化先机,他们依靠“丛林法则”转移社会转型成本,缓解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内在张力,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形态切换。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互利互惠而不是以邻为壑、合作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和平发展而不是暴力掠夺,走的是一条强而不霸的民族复兴新路。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17](P414)} 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所传达的人类和平和共享共建理念,提出并实践的独具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是对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之路的丰富和拓展,是对“世界之问”的有力回应。在世界现代化的新版图中,中国式现代化昭示着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

界”，“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18](P4-6)}。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可贵探索和重大成果，让世人坚信：这样的世界未来可期。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美]塞缪尔·P.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3][美]罗伯特·卡根. 我们的宪法危机已经到来[DB/OL]. [2021-09-17]. <https://i.ifeng.com/c/89sIGOYcl2g>.
-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邹庆国. 党的政治建设：历史逻辑、范式创新与体系架构[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8，（1）.
- [6][美]弗朗西斯·福山.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7]林尚立. 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
- [8]林尚立. 政治建设的中国范式：论党建在中国发展中的重要政治作用[J]. 社会科学战线，2014，（1）.
- [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0]习近平.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J]. 求是，2020，（14）.
- [11]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N]. 人民日报，2022-07-28.
-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13]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14][美]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 [15]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17]习近平.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18]习近平. 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王 篆

Party Leadership: Political Parties' Leading Logic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Zou Qingguo

Abstract: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which represents a new form of civilization, has been form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narrative of human moderniza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early modernization road of the west as well as its modernization theory based on western experience are currently trapped in a deep dilemma. On the other hand,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stepped into dependent modernization due to the absence of party role and the alienation of political logic. In solving the historical problem of “state ineffectiveness” and “social fragmentation” since modern times, the CPC has closely combined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realizing national rejuvenation with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of opening up a new road to national modernization, demonstrating the unique political logic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Party leadership is the core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ideals and beliefs, positions and missions of the party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system of modernization elements, which has promoted the integration and mutual shaping of the party value and modernization value, constructed the discourse system and narrative logic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deconstructed the western discourse monopoly and “meta-narrative” system, and created a Chinese “model” of human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party leadership,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political logic, new form of civilization